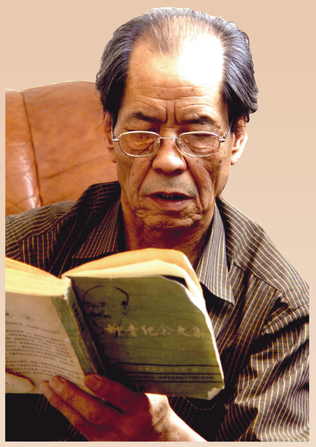
经典作家

纪念

陈忠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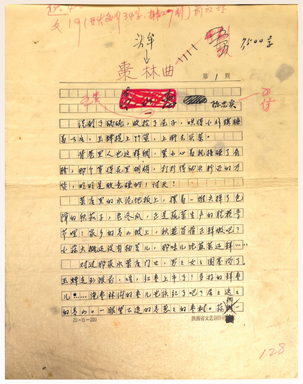
逝世十周年



陈忠实（1942—2016），陕西西安人，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白鹿原》，短篇小说集《乡村》《到老白杨树背后去》，中篇小说集《初夏》《四妹子》，散文集《原下的日子》等。长篇小说《白鹿原》发表于《当代》1992年第6期、1993年第1期，199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作品以白、鹿两个家族为核心，以史诗般的写作风格反映了中国几代农民的命运沉浮，蕴含作家对人生和社会的深刻思考，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等。《白鹿原》深受广大读者喜爱，被改编为话剧、电影、电视剧等多种艺术形式，是研究者和读者心中的“当代经典”之一。

今年是陈忠实逝世10周年，本报特邀专家学者李建军、李国平撰文，评述陈忠实的文学成就，追忆其精彩的写作人生。

——编 者



《乘林曲》手稿



《乡村》，陈忠实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



由孟冰编剧、林兆华导演的话剧《白鹿原》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



《初夏》，陈忠实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6月

愚人的谦德与集体性共创的典范

□李建军

一

柳青有不少文学名言，其中“三个学校”“六十年一个单元”和“文学是愚人的事业”最为人知。“愚人的事业”包含着柳青对文学劳动的本质的理解，包含着他对作家的生活态度和写作态度的理解，甚至包含着他对文学写作方法的理解。通过这句话，柳青似乎想告诉我们这样一些文学上的道理：文学写作是一种诚实的劳动，来不得半点虚假的东西，光靠一股机灵劲儿是不可能成为好作家的；文学要求作家把自己置于文学纪律和生活真理之下，老老实实服从它们的制约，切不可弄鬼掉猴，用任性而诳诞的态度来对待文学；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作家要虚心向生活和经典作家学习，要尊重读者的期待和感受，不可将文学写作当作显示才情的一个人的狂欢。

《周易·系辞》里说：“谦，德之柄也。”谦也是文学上的“德之柄”。对文学创作来讲，尤其是对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创作来讲，“谦”是一种影响成败得失的重要德性。《论语·子路》中说：“刚毅木讷，近仁。”从语义上看，“谦”和“愚”多多少少都与“木讷”沾点边，也都属于近乎“仁”的德性。孔子说：“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论语·为政》）陈忠实“如愚”又不愚，实属有大智慧的作家。他谦虚，低调，是一个踏踏实实的“愚人”型作家。他用诚实而谦卑的态度对待文学，身上毫无自命不凡的坏毛病。他从不师心自用、自吹自擂，也从不沾沾自喜、意气扬扬。他用最笨也最有效的方法，向那些伟大的作家学习写作，甚至向并不那么伟大的作家学习写作。他把契诃夫和莫泊桑的短篇小说的情节拆解开来，研究短篇小说的结构技巧和叙述方法。他甚至卑以自牧，降心相从，用心琢磨当代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和《古船》，从中学习长篇小说的结构方式。他在小说创作上的成功，得益于他的老老实实的学习态度，得益于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愚人”精神。

从文学体裁和写作方法的角度看，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写作对作家的谦德、事实感、求真精神和自我克制的要求，比对其文学才华的要求还要高一些。诗人可以是激情澎湃的，可以是高度主观的；散文可以显示作者自己的趣味，甚至允许作家放纵自己的个性。但是，小说家，尤其是现实主义小说家，必须克服诗人和散文家的自我主义倾向，必须学会克制自己的主观主义冲动。因为，现实主义小说的第一原则，是真实性原则和客观性原则。我们有理由相信，柳青所说的“愚人的事业”中的“愚人”，主要是指现实主义小说作家，尤其是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作家，而他所说的“事业”，主要是指现实主义小说的写作，尤其是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写作。

像柳青和路遥一样，陈忠实属于规范的现实主义小说作家。在写小说的时候，陈忠实像一个“愚人”一样，忘记自己的存在，成为认真的观察者和投入的体验者，专心观察和分析人物的心理和每一个细节；他从不放纵自己的想象，从不允许自己陶醉于任性的虚构和恣意的叙述。为了获得描写时代氛围和生活细节的真实感，他选择了“愚人”的老老实实的态度，一页一页地查阅县志，恭恭敬敬地向乡里的老辈人请教。他打开自己的记忆之门，努力还原自己童年和少年时代记忆中的“白鹿原”世界，他只写自己看到过、体验过和理解了的东西。他始终用读者能理解的方法进行写作。终于，陈忠实这个“愚人”型的作家，这个看似平平无奇的作家，一飞冲天，一鸣惊人，创作出了《白鹿原》这样一部令人震撼的伟大作品。

二

每一个善于学习的现实主义小说家，都属于自觉而成熟的“集体性共创”类型的作家。他们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孤独地写作，而是与所有那些影响了自己的作家一起进行集体创作。陈忠实就是一个堪称典范的集体性共创型作家。他接受柳青的文学观念，接受他的写作经验。柳青帮助他正确地理解了文学，理解了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柳青点燃了他在乡村从事文学写作的信心和热情，教会他如何从平淡的农村的日常生活里获取丰富的叙事内容，如何用生动的细节塑造性格饱满的人物，如何用简洁而诗性的语言描写乡村和旷野的风景。1980年4月，陈忠实写过一篇题为《我信服柳青三个学校的主张》的文章。他接受柳青把生活当作作家的“第一个学校”的观点。他还讲述了柳青对自己的写作的悉心指导：“不久前，从友人那里得到一份柳青同志对我的一篇习作批改过的手稿，灯下，我一字一句琢磨着修改过的文字，心里有一种难以遏制的激动情绪。在一节不足四千字的文字中，他删改过两百多处，添加了近乎一千字！整个版面上，连圈带划，眉头和行间，全注满了。当时，他正患病，而且艰难地进行着《创业史》的修改工作，定是很忙又很累的，对我的习作做出如此认真详细的批改，这需要付出多么艰辛的劳动啊！”柳青对陈忠实习作的修改，既是教他如何把句子写顺通，也是教他如何准确地叙述和描写，如何提高小说的修辞效果和说服力。在陈忠实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巨著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柳青塑造人物形象的成熟技巧，可以看见《创业史》的雄浑的史诗气魄。

几乎每一个文学意识成熟的作家都有自己最崇拜的作家，都有自己心目中的文学圣经。他们长期甚至终生热爱一部或几部深刻地影响了自己的精神成长、文学观念和文学写作的作品。从这些作品里，他们寻求生活的智慧和勇气，寻求文学写作的技巧和灵感。他们与这些作品的作者一起写作，一起经历文学创作所带来的痛苦和欢乐。陈忠实最崇拜的作家是柳青，最热爱的长篇小说是《创业史》。柳青的这部艺术价值很高的作品，就是陈忠实获得“集体性共创”经验和能力的重要文本。2010年1月23日，在《我读〈创业史〉》一文中，陈忠实高度评价柳青的这部带有明显的时代色彩的杰作，认为柳青从生活到艺术的创造过程，“达到了一个完美的过程，至今令我望尘莫及……我记得十余年间先后读丢过九本《创业史》。这本书读到后来，就是我有一点时间随便打开这本书，打开到任何一页或者任何一章，我就能读进去，而且就能把一切烦恼排除开，进入蛤蟆滩那个熟悉的天地，这种感觉是我这一生的阅读史绝无仅有的现象”。当有的人将柳青的这部小说视为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的时候，当有的人怀着鄙恶的心情弃之若敝屣的时候，陈忠实却坦率而诚实地表达了自己对柳青的钦佩，坦率而诚实地表达了对《创业史》这部长篇小说的喜爱。他知道自己从柳青的经验里学到了哪些宝贵的东西，他也知道柳青在创作上对自己有多大的影响。柳青的“以人物为中心”的小说创作经验，极大地影响了陈忠实的“跟着人物走”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对每一个人物在此情此景或彼情彼景下的行为和说话的个性化把握，要达到准确。”可以肯定地说，没有柳青的文学经验的滋育和支持，陈忠实的文学成长就不会这样顺利，也不可能如此成功地创作出《白鹿原》这样的现实主义巨著，如此成功地刻画出一系列个性饱满的人物群像。他与柳青一起完成了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白鹿原》的非凡的集体性共创。

柳青不仅影响了陈忠实的文学意识和小说写作，也极大地影响了他的人格精神。柳青在生活和写作中塑造了自己伟大的人格形象，也以“警示”的形式，帮助陈忠实认识到了人格境界对于一个作家的重要意义。1996年6月27日，陈忠实写了一篇题为《柳青的警示——在柳青墓前的祭词》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系统地总结了柳青作为作家的一生，高度肯定了他的文学思想和文学成就，将柳青当作值得当代作家学习的人格上的楷模和文学上的典范。他说：“作为艺术家的柳青，精神世界里贯注着一股强大的人格力量。他投身革命参与建设的同时也在锻铸着自己的人格，他创造艺术的同时也在陶冶自己的灵魂。他的一生留下的不仅是作品，也留下许多折射着他的人品光彩的生活故事。这些故事佳话和他的作品交相辉映，使我们看到了既作为艺术家又作为一个大写的人的柳青，文品和人品统一的柳青……柳青显示出一个民族的艺术家的铮铮铁骨和强悍的人格魅力。面对物欲膨胀而呈现出的某些生活的混浊，某些文章和人格的扭曲和分裂的现象，柳青无疑给我们以尤为贴近的警示。”人格是陈忠实这篇文章的核心概念，而高尚的人格则是柳青精神上的闪光点。柳青值得人们称道的地方，不仅在于他写出了《创业史》这样的史诗性的小说作品，还在于他的堪称伟大和高尚的利他主义人格。有人说，人格是文化的最终成果。在我看来，人格也是文学的最终成果和最高成就。有的时候，一个作家人格上的成就比他的创作上的成就还要重要。因为，文学首先是一种人格现象；没有伟大的人格，就不会有伟大的文学。一个作家，若人格低下，他的作品的价值和影响力，就要大打折扣。陈忠实的人格成长，与柳青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他始终将文学当作一种神圣而高尚的事业，在自己的小说作品中，他始终洋溢着对底层人的爱和同情，始终表现出良好的正义感和美好的道德诗意，始终表达对民族命运和人民福祉的深切关念。他的文学精神与柳青的人格精神、道德意识和人民伦理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这也是陈忠实与柳青一起完成的别样形态的“集体性共创”。

三

路遥也是陈忠实特别钦佩的作家，也是对他的文学创作影响很大的作家。路遥是一个具有思想家气质和巨大创造力的作家，陈忠实似乎缺乏这样的气质和创造力。就文学天赋来看，陈忠实似乎算不上天资过人、才华横溢的作家。他属于那种恂恂如也、谦光自抑的作家。他缺乏路遥身上的领袖人格、英雄气质和文学天赋。路遥明确表示要有“无榜样意识”。因此，除了在早期的《惊心动魄的一幕》里，能明显看见对雨果《九三年》的模仿，后来的《在困难的日子里》《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则显示出强大的创造力，几乎看不见依傍他人的明显痕迹。陈忠实则更依赖“榜样”的启示和引领，要靠着他者的支持来摆脱观念上的困惑和实践上的困境。所以，只有借助路遥的现实主义观念，只有借助卡彭铁尔的民族主义意识，他才能摆脱现代主义文学和先锋文学带给他的困扰和焦虑，最终实现现实主义文学意识的自觉和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成熟。

路遥生于1949年，比陈忠实要小七岁。一般情况下，向年长的人表示钦佩和学习的意愿，并非太难的事情，但是，向一个比自己年轻许多的人表达同样的态度和意愿，则非有服善的谦德，不易做到。然而，陈忠实却从不讳言自己对路遥的服膺，从不掩蔽路遥对自己的影响。2008年2月11日，在《摧毁与新生》一文中，他坦率地叙述了路遥的《人生》如何强烈地震撼了自己的心灵，以及自己从这部伟大的中篇小说中获得了什么样的文学教益。他用平静而又热情的文字这样写道：“我从延安回到文化馆所在地灞桥镇，当天就拿到馆里订阅的《收获》，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这部十多万字的中篇小说《人生》。读完时坐在椅子上是一种瘫软的感觉，显然不是高加林波折起伏的人生命运对我的影响，而是小说《人生》所创造的完美的艺术境界，对我正高涨的创作激情是一种几乎彻底的摧毁。”此时此刻，在他的内心，没有嫉妒，没有焦虑，没有任何消极的情绪，只有纯粹而美好的阅读体验，只有对路遥由衷的宾服和真诚的激赏。这是在许多作家那里很少看到的一种品质和修养。路遥的作品极大地改变了陈忠实对小说艺术的理解，推激他对自己的小说创作进行深刻的反思：“我重新理解关于写人的创作宗旨。人的生存理想，人的生活欲望，人的种种情感情态，准确了才真实。一个首先是真实的人的形象，是不受生活地域文化背景以及职业的局限，而与世界上的一切种族的人都可以完成交流的。到这年的冬天，我在反思中所完成的新的创作理念，写成了我的第一个篇幅不大的中篇小说《康家小院》，后来获得了《小说界》的首届评奖。许多年后，我对采访的记者谈到农村题材的创作感受时说出一种观点，你写的乡村人物让读者感觉不到乡村人物的隔膜就好了。这种观点的发生，源自在灞河滩上的反思，是由《人生》引发的。”这是一段令人感动的话。我们从中看见了陈忠实的服善的美德，看见一个如此善于学习的作家，看见一个如此善于进行“自反批评”的作家。就这样，陈忠实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实现了与路遥的集体性共创，将自己的小说写作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而为《白鹿原》的写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事实上，路遥不仅极大地影响了陈忠实的小说写作意识，也极大地影响了陈忠实的文学精神和文学观念。1985年，在河北涿县（今涿州市）召开的“农村题材创作”会议上，路遥的那句“我不相信全世界都成了澳大利亚羊”的话，路遥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自信不疑的坚定”，给了面临现实主义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对峙而陷入选择焦虑的陈忠实以极大的信心：“我更钦佩他的勇气，敢于在现代派先锋派的热门话语氛围里亮出自己的旗帜，不信全世界只适宜养一种羊。我对他的发言中的这句比喻记忆不忘，更在于暗合着我的写作实际，我也是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坚定的遵循者，确信现实主义还有新的发展天地，本地羊也应该获得生存发展的一方草地。”（陈忠实：《寻找自己的句子》）在这样的心照神交的共鸣中，陈忠实与路遥一起，完成了一次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集体性共创。路遥给了陈忠实继续进行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信心和勇气，而陈忠实则用《白鹿原》这部杰出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报答了路遥对他的文学意义上的巨大恩德。

四

陈忠实的集体性共创的另一股经验资源来自外国文学。由于文学教育不足等方面的原因，陈忠实与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经验是隔膜的。他坦承自己不喜欢那些在他看来打打杀杀、神神鬼鬼的中国古典小说，也不喜欢那些叙写贵族子弟们卿卿我我的爱情小说。读这些小说，他只觉得无趣和泼烦。他喜欢那些自然而亲切的外国小说。他的小说创作，主要依赖外国小说经验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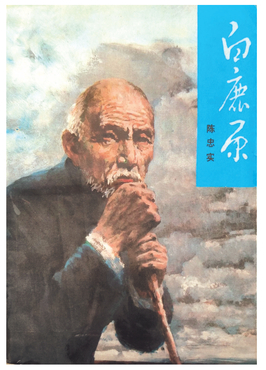
陈忠实与外国小说家的集体性共创，显示出一种自然、成熟而积极的特点，但亦偶见明显的瑕疵和败笔。譬如，他意识到了《百年孤独》的难读难懂的问题：“我便告诫自己，我的人物多情节也颇复杂，必须条分缕析，让读者阅读起来不黏不混，清清白白。”（陈忠实：《寻找自己的句子》）但是，也许是太喜欢马尔克斯的叙述方法，陈忠实最终也落入了许多中国作家都未能摆脱的“《百年孤独》式开头”的套版里。《白鹿原》劈头第一句是：“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这句既高明又不高明的开头，彰明昭著地显示着陈忠实对《百年孤独》生硬的模仿。事实上，无论从中国小说的叙事传统的角度看，还是从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看，提前预叙人物的最终心态和人生结局，并不是一种很高明的叙事方法。另外，就小说文本的具体情节和事象看，白嘉轩后来并未向人炫耀过自己娶了七房女人的“豪壮”。更何况，从人性和人道主义的角度看，六个年轻的女子，初为人妻，便相继殒命，这只会令当事者恐惧和心碎，而不是产生什么“豪壮”的心情。

对《白鹿原》的编辑处理，也凸显了这句话的消极修辞性质。他们将这句话从一大段文字里提领出来，孤零零地悬在那里，另成一段。这种着意强调的段落划分，虽然有助于强化预叙的悬念和吸引力，但也强化了模仿的痕迹和叙事的疏失。另外，陈忠实对田小娥与鹿子霖幽欢时的某些细节描写，对于性的过分渲染，对于震惊效果的过度追求，都显示着当时的消费主义文化潮流对陈忠实的消极影响，甚至显示着与当时的消费主义文化的一次失败的“集体性共创”。当然，与陈忠实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成就比起来，上面所谈的这些细小问题，可谓大醇小疵，白璧微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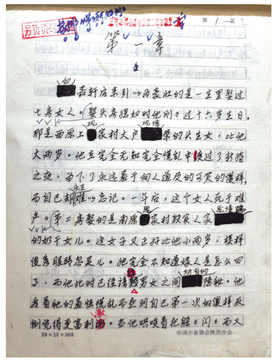
陈忠实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历程，就是向优秀的作家虚心学习的历程，就是与优秀作家集体性共创的历程。他向契诃夫和莫泊桑学习，掌握了短篇小说的技巧，与他们一起完成了短篇小说的集体性共创。他向柳青学习，接受了他的“从人物角度展开描写”，接受了他的写景艺术，从而与他一起完成了现实主义小说刻画人物和描写风景的集体性共创。他向路遥学习，用心揣摩他的《人生》，接受了描写人物复杂心理和复杂性格的成熟经验，接受了成熟而坚定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与路遥一起完成了现实主义文学的集体性共创。他向肖洛霍夫学习，接受了他的客观性原则、史诗性风格和悲剧性精神，与他一起完成了《白鹿原》的集体性共创。他向卡彭铁尔学习，自觉克服了他的沉闷和枯燥，接受了他自觉表现民族文化和民族经验的文学观念，与他一起完成了民族文学的集体性共创。他向马尔克斯学习，接受了他的自由而灵动的叙事方式，克服了他的繁复和缠绕，与他一起完成了小说叙事上的集体性共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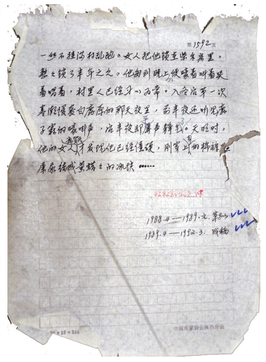
陈忠实是文学上的智慧的“愚人”。谦德是他身上闪光的美德。他是一个极谦逊的学习者，也是一个极高明的创造者。他懂得学习对于文学创作的意义。他对优秀作家和经典作品的学习，不是向下的沉沦，将它降低为拙劣而懒惰的抄袭，而是向上的升华，将他者的经验转化为创造的灵感、有用的方法和巨大的创造力。他通过学习，与那些伟大的作家一起，完成了自己的创造“垫棺作枕的书”的文学工程。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白鹿原》，陈忠实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6月





《白鹿原》手稿 陈忠实文学馆 藏

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李国平



2008年7月4日，陈忠实作为北京奥运会火炬手在西安进行火炬接力。

书写有生命力的文学世界

《白鹿原》1992年在《当代》第6期开始发表，至今已经30多年。2016年4月29日，陈忠实先生离世。2016年6月6日，中国作协召开“陈忠实的创作道路”研讨会，系统回顾了陈忠实的创作历程和文学成就。十年之后我们仍然认同研讨会对这部经典作品的基本概括：陈忠实的《白鹿原》是来自民族生活深处，是凝聚着文化和历史的丰厚经验的“中国故事”，它带领我们进入新的思想和艺术境界，把中国新文学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时任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和陈忠实有着几十年的文学交往，指出陈忠实是一个沉静、高洁的作家，他的一生有力地证明了，一个作家的精神境界、思想高度和人格力量决定着他作品的境界、高度和力量。陈忠实的文学道路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多方面的经验和启迪。

陕西的两代作家柳青、路遥、陈忠实在进行具体的创作的同时，也非常注重自己的思想修养和艺术修养，自觉地进行着理性思考和理论建设。柳青在创作《创业史》的同时，也在进行着紧张而激烈的艺术思考，路遥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陈忠实在创作《白鹿原》时，也是如此。柳青创作《创业史》时，写着《美学笔记》，《创业史》和《美学笔记》都达到了他所处时代的文学思考的高度，回应着社会生活领域和文学创作领域的前沿课题。路遥的《早晨从中午开始》不仅是他创作《平凡的世界》的生动记录，而且回应着、挑战着他所处时代的文学思潮，映现出他对现实主义的执着坚守和独特的创作追求。陈忠实在《白鹿原》之后，创作了《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书中写道：“我一开始就把这部小说概括了……就是卷首语里引用的巴尔扎克那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和创作《白鹿原》一样，陈忠实创作《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同样基于成熟的思考。他说：“这本小册子取名《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是决定要写这种创作手记之初便确定下来的。”《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打开了一个作家的文学生活，回顾了一个作家的文学道路和精神历程，详密、质朴、诚实地记录了一个作家在文学追求的过程中摆脱束缚，寻找自我、打开自己、超越自我、成就自我的跌宕艰难的历程，也是作家向文学高峰攀登的过程。陈忠实说，“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是海明威说的。陈忠实在这句话里，获得了超越具象的理解和启发：“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如同勘探者寻矿源；这句话尤其着重在‘属于自己’这个划界，可以说把作家的个性化追求一语道破了。任谁都一目了然，海明威所说的‘句子’，不是寻常意义上的白描或叙述的语言句子，‘句子’在此不过是一个形象比拟。海明威说的‘句子’，是作家对历史和现实事象的独特体验，既是独自发现的体验，又是可以沟通普遍心灵的共性体验，然而只有作家独自体验到了；他说的‘句子’，自然也包括了艺术体验，以一种独特的最适宜表述那种生命体验的语言完成叙述。作家倾其一生的创作探索，其实说白了，就是海明威这句话所作的准确而形象化的概括——‘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那句‘句子’只能‘属于自己’，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句子’，作家的独立的个性就彰显了出来，作品的独立风景就呈现在艺术的殿堂里。”

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创作体验和经验，而经验的生命力应该存在于文学生活和文学世界之中。陈忠实坦陈自己的艺术追求，是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所得。陈忠实在创作《白鹿原》的过程中，激烈而深沉地思考民族生活的大命题，并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海明威的形象表达，在陈忠实这里超越了具体情景、个体创作，成为提升文学创作根基性、本源性的命题。任何时代，任何作家，如果要原创，都要有独创性，有高标的文学追求，要面对这个本质而鲜活的命题。

寻找时代和历史的深度

陈忠实对“寻找自己的句子”的追求，贯彻于他的文学人生，体现在具体的创作中，形成了他的文学生命。这个过程的每一步，都是一次超越、深化，在具体创作实践中形成基本观念的过程。

陈忠实早期的创作，质朴、本色。对于他这样来自基层，从生活深处走出来的作家来说，生活体验是一个感同身受的信念。“我后来比较看重生命体验，这是我写作到八十年代后期自己意识到的。无论是社会生活体验，无论是作家个人的生活体验，或者两部分都融合在一块儿了，同时，既是作家个人的生活体验，又是作家对社会生活的体验，在这个层面上，我觉得应该更深入一步，从生活体验的层面进入生命体验的层面。进入生命体验的这种体验，在我看来，它就更带着某种深刻性，也可能更富于哲理层面上的一些东西。”陈忠实认为，从生活体验进入到生命体验，已经经过了一个对现实生活的升华过程。这就好比虫子从出生蜕变到蛾子或者蜕变成美丽的蝴蝶一样，它一旦化蝶了，就进入了生命体验的境界，就在精神上进入一种自由状态。陈忠实说，“这个‘化’的过程就是从生活体验进入生命体验的一个质变的过程。这里面更多带有作家的思想和精神色彩”。一个作家的创作如果总是停滞于原始的、感性的反映论层面，它上升的高度一定是有限的。一个优秀的作家，具有经典意识的作家，一定是理性意识不断提升，注重生命体验，将文学认识内化为自己的生命意志，然后再贯彻于自己的创作实践的作家。“哲理层面上的一些东西”，“作家的思想和精神的色彩”，标志着陈忠实对文学思考的自觉、层次和深度。作为作家的陈忠实，思考自己的语言方式，当然注重叙事学方面的功能和意义。但是陈忠实不会只注重“叙述语言的内在张力和弹性”，不认为叙述和描写是一个外在的语言形态，“而是作家对他的人物的透彻理解和掌握”，在于对“人物的理解和体验的程度”。“体验的程度”通过叙述语言表达出来，无疑包含着作家的认知和态度，寻找一种语言方式，毋宁说是在寻找着时代内涵和巨大的历史深度。

创造全新的艺术风貌

从艺术技巧、写作智慧和驾驭功力来说，许多作家都意识到长篇小说结构的重要性。陈忠实认同这样的说法，长篇小说是结构的艺术。寻找《白鹿原》的艺术结构，陈忠实有一个过程。在他最初的中篇小说创作阶段，陈忠实说，“我当时想通过各种不同的中篇小说结构，来练习写作的基本功力”。陈忠实在艺术准备阶段，阅读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和张炜的《古船》时，特别着意关注分析这两部优秀长篇小说的结构，“《活动变人形》呈现一种自然随意的叙述方式，结构上看去不做太讲究的痕迹，细看就感到一种大手笔的自由自在的驾驭功夫……我在《古船》的阅读中却看到完全不同的结构方式，直接感知到一种精心设计的刻意”。研读经典作品后，陈忠实获得了这样的认识：“任何一种结构都是作家的创新，没有一个作家能依赖别人的框架来装自己所要表现的生活内容，任何作品都是作家一次新的创造形式，也就是说自己的结构要靠自己去创立……只有将一个全新的艺术风貌的作品拿出来，才能争取到它的生存价值。”陈忠实得到关于结构的启示，“不单是一个方式方法问题”，“而是首先要对人物的深刻体验”，“最恰当的结构便是能负载全部思考和所有人物的那个形式”。卢卡契认为，一个作家的世界观越深刻，越是与众不同，越是为生动的经验所营养，越是进入深刻的体验，它在作品中的表现越是独特。卢卡契的理论论述，是对文学经验的总结。陈忠实通过自己独特的创作实践，获得了相同的命题，并且破解了这个命题。在陈忠实这里，对于艺术结构的理解、寻找的过程，上升到了一个作家如何把握世界的高度。

艾略特曾经精当地辨析过个人创作和文学传统的关系，离开了文学经验、文学背景，一部作品不能具有完全意义。哈罗德·布鲁姆有“影响的焦虑”说，“影响的焦虑”似乎可以在消极的层面解释当下文坛一些消极的现象，但它不是哈罗德·布鲁姆的本意，也不能解释陈忠实和柳青的关系。批评家白烨先生曾论述陈忠实早期的创作，他敏锐地发现陈忠实和柳青、和王汶石的差异。白烨说，陈忠实“撷取了柳青叙述故事的直率和抒发情感的热烈，但似乎又缺少了柳青作品中那种始终以豪迈贯之的主调；他借鉴了王汶石勾绘细节的真确和行文运笔的洗练，但似乎又缺少了王汶石作品中那种欢乐明丽的底蕴。他的作品劲爽，但劲爽中常常掩伏着隐忧；他的作品热情，但热情中时时显见出谨饬”。陈忠实说，“柳青是我最崇拜的作家之一，我受柳青的影响是重大的”。但是，“到八十年代中期，我的艺术思维十分活跃，这种活跃思维的直接结果，就是必须摆脱老师柳青”，“一个在艺术上亦步亦趋地跟着别人走的人永远走不出自己的风姿，永远不能形成独特的艺术个性，永远走不出被崇拜者的巨大的阴影”。“艺术的要害在于‘创’新而忌讳模仿。”在这个层面上理解陈忠实和柳青的关系，人们可以读出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的勇气、雄心和文学行动。然而，陈忠实谈及他和柳青的关系还有一层：“我后来意识到这本书和这个作家对我的生活判断都发生过最生动的影响，甚至毫不夸张地说是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个影响在于对于文学与时代、与历史关系的认识和处理，在于如何书写历史运动的整体方向，包含着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和作品内在的宏阔性这个大命题。在这个意义上，哈罗德·布罗姆是深刻的，他说，“没有文学影响的过程……就不会有感染力强烈的经典作品出现”，“创造力强的作家不是选择前辈，而是为前辈所选，但他们有才气把先辈转化到自己的写作之中”。如果深入地考察陈忠实和柳青之间承传和创新的关系，他们的关系便是这样。

20世纪80年代，陈忠实读拉美作家卡彭铁尔的《王国》，卡彭铁尔在欧洲寻找文学的家园和真谛，说了一句决绝的话：现代派的旗帜下容不得我。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这本书里写道：“我读到这里时忍不住‘噢哟’了一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作协在河北涿县（今涿州市）召开“农村题材创作研讨会”，路遥在发言的结尾说，“我不相信全世界都成了澳大利亚羊”。陈忠实写到，他敬佩路遥的勇气，敢于亮出自己的旗帜，不信全世界只适宜养一种羊，这种观点与陈忠实的写作观不谋而合。陈忠实在文学创作道路上，曾经不止一次发生过危机，经历过“最严重的一次痛苦”，“进行过一次又一次从血肉到精神再到心理的剥离过程”，如同“托尔斯泰的‘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陈忠实终其一生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他认为自己的创作“离高峰还很远，只能把这当作攀向另一个高峰的台阶，争取获得实现另一次突破的途径和力量”。“我还将继续‘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命运让陈忠实告别了寻找的过程，却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经验和启迪。

（作者系陕西省作协副主席）